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新境界

姜锡东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已经走过 100 多年的历程。如果从古代“食货之学”开始,那就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对此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回顾总结并非易事,但非常必要,它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清现状,科学地规划未来,推动学科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此略抒管见,请大家对疏谬之处批评指正。

一、历史回顾

据有关专家学者统计,1900—1984 年上半年共发表中国经济史论著 2 万种(含港澳台);^①1986—1995 年中国内地共发表相关论著亦近 2 万种,“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 85 年有关论著的总和”;^②根据《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历年“综述”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史》历年“索引”,1996—2015 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共发表相关论著 5 万多种。李根蟠先生曾发表两篇论文进行回顾总结;李伯重先生曾划分四个阶段进行回顾总结,并特别注意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他们宝贵的总结工作下限,是 21 世纪初,最晚到 2008 年。^③今年召开的第三届“上财经济史学论坛”暨《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 30 周年研讨会上,又有数位专家对此作了回顾总结。^④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水平越来越高。尽管这一历程不是笔直向前而是有起伏波动的,但总的格局是向前发展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引发两次经济史研究高潮(第一次是 1927—1937 年,第二次是 1977 年至今)。总括来看,呈现出 5 个特点:(1)史料的发掘、整理、检索飞速发展。在传统文献之外,新开发整理的甲骨文对殷商、金文对西周至战国、简帛对战国至魏晋、敦煌吐鲁番文书对魏晋至宋初、徽州文书和其他各种档案文书对明清民国经济史的研究,都起了巨大的基础性推动作用。近 30 年经济史料的电子化、数据化和网络化,又为新旧经济史料的检索和解读提供了巨大便利。(2)经过长期的努力,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努力,虽然事实不清、空白之处尚多,但商周以来经济史的基本事实还是被揭示、确定了下来。除国家经济制度、政策和概况外,传统旧史学所忽略的部门、行业、少数民族和区域经济史事实,尤其是基层社会和下层劳动大众的经济史事实,得到空前多而细的揭示与确定。(3)理论之一——经济史全局性、规律性问题研究获得很大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发展动力”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探讨,核心问题是经济史。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研讨,带动了许多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探索,表面上看迄无定论,观点多元,其实多有新突破,存在不少共识。(4)理论之二——方法论有重大提高。毫无疑问,传统考据学(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西方多元化史学,构成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三大板块。除第一种方法是中国古已有之,

[作者简介]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保定,071002。

①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济南:齐鲁书社 1988 年版。

② 李根蟠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 联合增刊。

③ 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 年第 5 期;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 年联合增刊、2006 年第 1—2 期笔谈等;2015 年上财研讨会的情况可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82—187 页。

第二、三种都是从国外引进,都对经济史研究发挥巨大威力。(5)学科建设。经济史方面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无到有到多,具有硕士、博士学历和博士后经历的经济史研究队伍在1978年以后呈现“井喷式”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专门刊物的创立以及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创建,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飞跃式发展的体现。

二、现状与不足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特别是近30多年的发展,成就巨大,我们对此应予充分肯定。这些发展和成就,为今后的长远前进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我们对此应有充足的信心。但要科学谋划好未来的发展,首先必须在回顾反思历史和认真分析现状前提下,找出我们存在的不足和制约发展的瓶颈。这个问题,实际上分为三个层级:第一是众多独立的个人,第二是各个单位(研究所室、高校相关学科等),第三是全国(整个学科和各个专门性研究会)。显而易见,三个层级各有自己独特的基础、成就和缺陷、困难,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个人、单位层级的情况做出具体分析,重点是对全国情况略抒管见。当然,探讨全国情况,对个人和单位肯定也具有参考作用。2006年,为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者曾发表《两级分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文,认为当时的全国现状和问题是“六多六少”局面:论文多,著作少;断代研究多,贯通研究少;在断代研究中,个案研究多,通盘研究少;在贯通研究中,专题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实证研究多,理论阐释少;就经济论经济多,把社会经济全面联系起来研究者少。9年过去了,今天看来还是这种局面。如果说有什么新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电子网络化日益增多,纸质文本比例日益减少。二是多元化日益增强,闭门造车者日益减少。但这些新变化都是好事,不必多说。问题和缺陷在于“六少”。

对“六多六少”局面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前揭拙文已作述评,这里新补充强调四点。第一,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也存在“碎片化”倾向。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专家学者,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进行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比较普遍而严重的“碎片化”弊病,缺乏整体性贯通性研究,缺乏思想和理论。其实,经济史研究领域又何尝不存在“碎片化”问题?第二,经济史学的功能远未发挥出来。众所周知,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来源于经济史,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但在我们中国——一个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有多少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出自经济史专家?本来,中国的经济史专家在梳理反思中外经济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教训,抽象概括经济学理论方面,具有其他领域专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应该大显身手,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第三,在高等院校,经济史学科处境尴尬。按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经济史只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而理论经济学都设置在经济学院(系),他们普遍不太重视经济史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购置,不太重视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发展。从事经济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多数出身于历史学科。在历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中,经济史仅是在二级学科“专门史”中列出的一个研究和招生方向。这种不科学的制度刚性学科分类,导致如下恶果:经济学院(系)培养出来的经济史专家史料功底大都比较浅薄,历史学院(系)培养出来的经济史专家经济学理论功底大都比较浅薄。第四,缺乏“中国气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中国制造”名扬世界,震撼全球。然而,中国现在是经济实践的巨人,却是经济理论的矮子。经济学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非常缺乏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经济史总结与阐释。伟大的实践,理应产生伟大的理论,并以伟大的新理论指导未来的伟大实践。但现状远非如此,外国学者的总结和理论倒是在中国影响甚大。

三、四点建议与新境界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要进入新境界,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有新措施、新理念和新气象。对此,学术

界同仁自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谨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把经济史二级学科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上升为一级学科。这种转变与改革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一念之差、一念之转而已,只需国家有关部门一纸命令即可做到。但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类改革和命令,都是来自基层的实际需求,都是经过各地专家反复论证才会出现。这就需要基层的相关专家认真论证,积极上书献言献策。难点在于一旦经济史分离出来上升为一级学科,到底是归于经济学类还是归于历史学类?到底是置于经济学院(系)还是置于历史学院(系)?我认为应该归置于经济学类和经济学院(系),但必须与历史学院(系)合作共建。将来其兴衰成败,取决于二者的合作共建水平。

第二,大力研讨“看得见的手”。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看不见的手”——自由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视,研究论述很多,这是无可厚非、应予充分肯定的。问题和缺陷在于,对“看得见的手”——政府对经济生活强制干预的作用,不太重视,研究论述很不够。在这个事关全局、事关久远的重大战略理论问题上,只研讨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奋力研讨中外经济史和中外全部历史。在古今中外所有大国中,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较大,政府这一国家权力机关出现较早,延绵持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制干预,既有很失败很惨痛的教训,也有很成功很辉煌的经验,是研讨“看得见的手”最好的典型案例。奋力研讨并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具现实价值,而且极具世界意义。观察研讨欧美等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运行与发展,忽视其“看得见的手”也是大错特错。诚恳希望相关杂志编辑部和学术团体,率先发起组织这种研讨。

第三,大力研究经济发展之“度”。经济发展缓慢,当然是坏事,是人们不愿看到的。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这是个重要问题,需要从全局、久远的视角来认真研究。在中国古代、近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是“短缺经济”时代,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现在世界上仍有约10亿多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中国约有5000万多)。在这样的时代、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但仅从中国当代经济史就可清楚看到,刚解决温饱问题、摆脱短缺经济时代,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呼啸而至,令人难以忍受。这时人们自然会怀疑,经济发展速度真的是越快越好?近30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性地具有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的理念。这两年速度一降,很多人就很不适应,怨声四起,甚至惊慌失措。现在冷静观察,从全局久远出发,可知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必须与环境承载力、资源供给力、社会有效需求和国家安全等要素协调一致,确实必须把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中国与世界统盘考虑规划,确实必须适度发展。但是,这个“度”究竟是多少,究竟多快才算“适度”,真是个难题,不易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牵涉范围极广,千头万绪,仅靠个人、一两个单位是解决不了的,必须广泛发动,精心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科学研讨。难度再大,不组织研讨永远解决不了。早日组织研讨,总有解决之时。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地区、行业、企业也是如此,都有发展规划中的“适度”问题。

第四,积极构建“中国气派”。要构建科学而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史研究中,必须经常反思“六少”和“碎片化”的缺陷,奋力开展贯通性和全局性研究。由于开展贯通性和全局性研究难度大,许多人会敬而远之,靠专家学者个人去自愿地进行这类研究是消极被动的,有关机构、团体和杂志社应该主动地有计划地将其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组织实施,积极推动。只要规划合理,推力强大,具有“中国气派”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就一定会产生出来。

(责任编辑:黄英伟)